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y Adrian Arthur Bennet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ix+157. Appendices; Notes; Bibliography; Glossary; Index.)

本書原附中文題名傅蘭雅譯著考畧，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所出版的專刊之一。著者班乃特博士 (Adrian Arthur Bennett) 利用柏克萊 (Berkeley) 加州大學圖書館總館所藏的「傅蘭雅文書」 (Fryer Papers)、與東亞圖書館所庋存的傅蘭雅舊藏中文書籍，益以中、西文有關的資料與著作，成此考述。傅蘭雅為十九世紀後半西學傳入中國的主要媒介人物之一。因此，以傅蘭雅為中心，考察當時西書的傳入以及與西學有關的書冊編譯出版的情形，對於明瞭近百年中西學初傳中國時的狀況，自屬饒有意義的工作。

本書正文分三章：第一章「早年時代：一八三九至一八六九年」，為有關傅蘭雅的家世、教育、自英國東來經過、及其未入江南製造局前在中國就業的經歷。第二章「中國官局翻譯洋員」，綜述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的工作。第三章「為推廣西學而努力」，歷舉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供職期間，以私人地位所參加的推廣西學的活動。書末載「附錄」五種：一、一八六八至一八七〇年傅蘭雅為江南製造局定購圖書儀器標本詳單；二、傅蘭雅編譯書冊總目；三、一八七一至一九〇二年江南製造局刊行其他洋員編譯書冊目錄；四、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所列傅蘭雅編譯書冊分類表；與五、一八九六年格致書室發售中文圖書目錄。其中附錄二乃根據上述東亞圖書館伊爾文博士 (Richard G. Irwin) 所製的表改製。

傅蘭雅生於公元一八三九年，英格蘭人，於卒業師範學校後因就業東來，一八六一年八月至香港，任聖保羅書院 (St. Paul's College) 校長，兼授英文。聖保羅書院當時的宗旨，在造就華人充當英國教會的教士。一八六三年傅蘭雅去北京，繼包爾騰 (J. S. Burdon) 任同文館英文教習，但逾年即去職，繼其任者為丁韞良 (William A. P. Martin)。在同文館時期傅蘭雅開始學習中國官話，並因職務之便得與在京的各國人士交遊，如卜魯斯 (Frederick W. A. Bruce)、威妥瑪 (Thomas Wade)、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李國泰 (H. N. Lay)

與赫德 (Robert Hart) 諸人是。一八六五年，傅蘭雅就任教會在上海新創的英華書院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的校長的職務，同時仍兼授英文，繼續學習中國語文。傅蘭雅對於傳教主張緩進，認為學校教學有濃重的傳教氣息，將令有志向學者卻步不前。但教會創設英華書院，除了教授華人英文外，尚旨在吸收華人為教徒。因為對於傳教的主張不同，故教會不滿意傅蘭雅在英華書院的工作，從而使他的職位為之動搖。(頁一二至一四) 為求獲得一較為穩固的職位，傅蘭雅乃於一八六八年接受江南製造局的延聘，任該局的翻譯洋員。傅蘭雅的任職英華書院，自一八六六至一八六八年，同時他也為教會主編中文期刊教會新報。該刊在他轉就江南製造局的職務後，由林樂知 (Young J. Allen) 接編，為萬國公報的前身。

江南製造局為李鴻章所創辦，旨在求國家自行造船製器，為同治新政時期最具規模的建設事業之一。對於該局的籌備、擴充和經營，曾國藩和丁日昌也曾與有大力。製造局附設有翻譯學館，延聘洋員編譯有裨於製造之書，一以供局中對於用器與製造之事明其所以然，一以備為教材，供日後招收生徒隨同肄習之用。傅蘭雅在製造局即供職於翻譯學館，同事尚有洋員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瑪高溫 (John MacGowan)、金楷理 (Carl Kreyer) 等人，華員有徐壽與徐建寅父子、華蘅芳等人。翻譯方法大體由洋員口述，而由華員筆錄與整齊文字。

在翻譯學館，傅蘭雅可自行選擇應購應譯之書，局方甚少過問。但譯書既是製造局的工作的一部分，以求有裨於製造，則選擇自然需要以有關於工業與應用科學者為先，如工程、工藝製造、航海、陸海軍事、地質礦物、數學、醫學等是。此如康有為於一八八六年所說，「傅蘭雅所譯西書，皆兵醫不切之學」是也。(見上粵督張之洞建議廣州設立譯書局書。) 傅蘭雅自稱其本人不過一「半受教育之人」，對於此項譯書的工作，處處須先從頭學習，其勤勞可知。一八八〇年後，傅蘭雅的選譯書籍，更見精審，內容也愈益趨重於基本的自然科學方面；自一八八五年始，並間有歷史和社會科學的著作選譯。傅蘭雅編譯書冊經刊行的總計有一百二十九種，其中大部分屬製造局的工作，但也有部分乃為教會所設的益智書會 (The School and Textbook Committee) 所編譯，部分則係由其自己所創辦的格致書室 (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 出版，也尚有小部分乃在他一八九六年離華後始印行。此一百二十九種譯書中，刊行於一八八〇至一八九六年間的計七十八種，其中屬於自然科學者四十三種，屬於應用科學者十九

種，屬於歷史與社會科學者七種，屬於陸海軍事者四種，其他五種。傅蘭雅之開始編譯歷史與社會科學書籍，也表示他已有見於中國當時對於此類為自強運動所忽視的知識的需要。（頁三七至四〇）

此外，傅蘭雅以他長時期實地從事翻譯的經驗，並已發覺中國語文足以充分有效供各類著作的翻譯之用，與科學辭彙的譯名有完全加以統一的需要。（頁三〇至三三）

傅蘭雅任職江南製造局，首尾二十九年（一八六八至一八九六年）。此二十餘年中，他同時並主持廣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所創設的格致書院（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Reading Rooms），主編格致書院所發行的格致彙編（*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為益智書會任主編教科書的工作，並自辦一書局格致書室。格致書院成立於一八七五年，初僅設置圖書室，陳列科學書刊供公眾閱覽；但其後工作推廣，一八八四年起舉辦論文比賽，一八九四年起招收肄業學生，並舉辦華語科學講演。格致彙編發刊於格致書院成立的次年（一八七六年），內容有專篇、短論與問答等欄，艾約瑟（Joseph Edkins）、瑪高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等人皆曾為其撰文。格致彙編雖屬月刊，但發行常有間斷，至一八九一年後停刊。益智書會為基督教在華各派全會（The General Mission Conference）於一八七七年所決議成立，宗旨在編譯與出版教科書，以改善教會學校與一般學校的科學教材。傅蘭雅初任該會的秘書，後改任主編。至一八八六年止，該會共刊行數學、自然科學、史地、語言、音樂等教本一〇四種，其中約四分之一為傅蘭雅所編譯。（頁六一）該會所出各書大抵皆精選英、美原本，而編譯工作認真。（同上）格致書室為傅蘭雅所自創，總店設上海，分銷處遠及天津、漢口、汕頭、北京、福州、與香港等地。其一八八八年的發售書目中，所列有關西學的中文書籍達六五〇種。（頁六四）當傅蘭雅於一九一一年最後退出此一事業時，上海時報曾撰文稱譽，稱此書室為「多年來中國青年學子巡視西方之聖地」。（頁六五至六六）凡此傅蘭雅所任的公私事業，宗旨皆同，此即在中國推廣西方科學知識的傳播。

本書著者於第一章中不憚其煩，指陳傅蘭雅的東來及其早年在香港和中國的就業，始意皆不過在求獲得一較優良與穩固的職位。但在他任職江南製造局的近三十年中，則見他愈益認識中國當時對於西方知識的需要，和他自己為中國的此項需要而獻身效力的

熱誠。西方人士為介紹西學於中國，以中文編譯書刊，早於傅蘭雅的時代的有明清之際的入華耶穌會士，而與傅蘭雅相先後的有廣學會的濟濟多士，但從無一人其專心致意的期間之久與成績之豐富如傅蘭雅者。（頁六八至六九）傅蘭雅東來時尚是二十許少年，離華時已年近六十，受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之聘，為該校首任亞格昔東方語文講座教授（Louis Agassiz Professor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在他任教加州大學的期間（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三年），他仍時時以中國為念。其晚年為中國效力的是盲人的福利與教育事業，創辦盲啞學校，並以其遺產充在華推廣此項事業之用。

本書行文簡淨，條理明暢，表達十九世紀後半西學傳來中國的過程中傅蘭雅的地位，也深中肯綮。本書應用西文資料，除近人的著作之外，並廣泛涉獵更為原始的史料如「傅蘭雅文書」與同時期的報章期刊，皆彌足稱貴。但反之，本書的弱點，則在其應用中文資料的不足。舉其最顯見者而言，如第一，本書所附書目列有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種，但卻未列同叢刊的洋務運動。案傅蘭雅留華時期實與洋務運動（或自強運動）的時期相終始；而他所服務的機構江南製造局，且屬洋務運動所創設的最重要的機構之一。因為本書著者所着眼者唯在戊戌維新運動，所以本書曾引述維新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道及傅蘭雅之處，以見其對於中國知識人士的影響，而於洋務運動時期或辦理洋務人士如曾國藩、李鴻章、鄭觀應、王韜、徐壽、華蘅芳、徐建寅、徐潤、邵作舟等人的有關文字，則未着一語。

第二，即以本書之徵引維新人士的文字言，亦有欠勻稱，大抵皆自上舉戊戌變法的第四冊轉引。但書目中於譚瀏湯全集與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又單列，而康南海自編年譜則不列。故康、梁等人在思想上所受傅蘭雅的影響，本書亦猶未充分闡明。

第三，本書對於維新運動當時的重要報刊如時務報、湘報、湘學新報等，則概未應用。此類報刊中每有徵引格致彙編與江南製造局所出的譯書之文；而湘學新報所載梁啟超的「書目提要」的說明，也比較其西學書目表的說明為詳審。如有關傅蘭雅所譯的佐治芻言一書，本書引書目表，謂梁指為「政治學最佳之書」，（頁四四）而書目提要僅謂其於「家國相通之理」，所論「最為明晰；」而於機器及銀行除借諸法，「尤為中國所宜詳究。」

第四，本書道及傅蘭雅編輯教會新報之事，但對於教會新報及繼其後的萬國公報，則皆未加應用。教會新報於一八七四年改稱萬國公報，一八八三年一度停刊，至一八八

九年復刊，成爲廣學會的機關刊物。傅蘭雅又爲萬國公報的撰述人之一，故其中不乏有關傅蘭雅的重要資料。試舉一例言之：萬國公報第七卷（一八九五年）第七十七冊即載有傅蘭雅的啓事一則，徵求描述鴉片、時文、纏足之害的時新小說。同報第八卷（一八九六年）第八十六冊又有短啓，報告傅蘭雅時新小說「出案」。此在瞭解傅蘭雅在中國的思想生活上，無疑甚饒意味。又如傅蘭雅於格致書院早有舉辦論文競賽之事，其後廣學會於萬國公報踵行之。一八九四年的一次競賽於次年二月揭曉，審定者爲王韜，獲取者中廣東第十名爲康長素（有爲），見萬國公報第七卷第七十四冊，亦爲一饒有意義之事。

第五，著者對於中文資料的生疏，尚可於以下一事見之。著作自謂於羅榮邦教授處獲知有俄人齊赫文斯基（S. L. Tikvinsky），撰有中國變法維新運動與康有爲一書（頁一四三，註七七）。實則該書早有中譯本發行，一九六二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本書應用中文資料的貧乏，其爲美中不足，無可諱言。惟讀者苟不於此深求，而僅就其所用資料的範圍而言，則本書文省事豁，具見史才。書中遇有引用中文資料處亦頗審慎，讀音、釋義與字劃皆甚少錯誤，亦頗難得。又本書譯東華錄爲 *Summary of Events*（頁一三〇），竊意似以譯 *Documented Chronicles* 爲宜，而 Hsü Chung-ku 一名凡兩見（頁二八；頁一四一，註四三），想係 Hsü Chung-fu 之誤，仲虎，徐建寅字也。

王德昭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By Ramon H. My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94 pp. \$12.00.)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尤其韓戰以後，由於世界局勢的轉變，美國朝野對中國問題的關切日增，因而中美學人對中國問題研究的興趣也日趨濃厚。僅僅就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來說，成績已斐然可觀，例如，芝加哥大學教授何炳棣對於人口的研究，哈